

中国与世界观察

China and World Affairs No.1,2005

特集：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与国际意识

走在当代中国主流思想界的前面——回顾与展望当代中国民族主义

当代中国需要民族主义——兼论中日关系

融入世界的中国——一个追求国际民主、宣示中华民族个性的过程

从民族自卑到民族认同提升——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青年的影响

只提爱国主义还不够——兼论“不能盲目抵制日货”

爱国：中国人的骄傲与忧思

中国和平崛起只是可能不是必然——从对外关系角度论中国崛起的条件

没有解决的国家定位——影响21世纪中国国家定位的五大因素

走出大国力量小国心态的误区——兼论中日关系的困境与出路

认识当代中国的三个视角

当代中国的世界战略——兼论“不以小泉为伙伴”的对日外交

王小东

林治波

张文木

房宁

刘江永

朱锋

时殷弘

金灿荣

金熙德

王逸舟

(日)赵宏伟

中国发展面临的若干问题与政策选择

现行中国政体面临的五大问题与机会

当代中国工人的“以理维权”

迫在眉睫的中国危机管理体制构建

中国应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严防泡沫经济的战略选择——房地产政策新思维

一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

潘维

于建嵘

初晓波

李玲

杨帆

李稻葵

Neil C. Hughes



China and World Affairs

中国与世界观察

2005 年第 1 期

(总第 1 期)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主办

李稻葵 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 · 北京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与世界观察
2005 年第 1 期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主办
李稻葵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航 丰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4767-6/F·595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41/2

定价:28.00 元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编辑委员会:

丁学良	马 戎	王缉思	王逸舟	白重恩
李培林	李若谷	李稻葵	李剑阁	李 强
时殷弘	张维迎	张宇燕	林毅夫	房 宁
胡鞍钢	胡祖六	钱颖一	黄 平	黄亚生
阎学通	谢 平	雷鼎鸣	楼继伟	樊 纲
潘 维	薛 澜	魏 杰	魏尚进	

主 编:李稻葵

执行主编:杨学军

编 辑:路江涌 王文博

编辑部网页: www.ccwe.org.cn

编辑部地址:清华园舜德楼南 101

编辑部电话: (86—10) 62796478

邮政编码: 100084

E-mail: yxj37@263.net lit6@em.tsinghua.edu.cn

编辑手记

10 多年前,一夜间,苏联的瓦解,冷战的终结,让所有的人吃惊。

10 多年后,中国的崛起,同样没有先兆,同样让所有的人吃惊。一日千里,有些夸张。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快,并非虚言。人类、世界原先的格局和节奏,在 20 世纪、21 世纪之交的一二十年中,颠倒了。从政治家到平民,从学者到记者,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看法赶不上变化,成了不争的事实。

崛起的中国,将往何处去?她在改变自己的同时,将如何影响乃至改变世界,或世界将如何影响乃至改变她?认识中国,成了当前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同样,认识中国,认识世界,也成了当代中国主流社会——从官到民、从学者到学生关注的核心内容。2005 年 7 月 3 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召集中国著名的国际问题、政治问题专家,围绕“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与国际意识”展开研讨,其主要内容就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中国与世界观察》第一期特集。

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与国际意识,或通俗所说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不仅是中国主流舆论中的热门话题,从中央电视台到《人民日报》,无不如此;也是新近迅速崛起的中国民间舆论中的热闹话题、甚至核心话题,从《强国论坛》到新浪网,从《环球时报》到凤凰卫视中文台,均是如此。当代中国人的视野,与当代中国的实力

提升同步,已不再拘泥于昔日封闭、消极的中国镜像,开始迈向开放、积极的中国镜像。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全世界包括日本都在谈论日本第一,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崛起。在经历了90年代“失去的十年”后,世界第一对日本已成了未圆之梦。与日本不同,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超级大国,虽然在近代倒下了,但没有彻底完结,超级大国的架式依然存在,未来的中国,资源要走进来,人要走出去,使得中国不是向大国的方面走,而是在往超级大国的方向走。作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王小东在《走在中国主流思想界的前面——回顾与展望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中强调: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长远目标,就是为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奋斗,而谋划。虽然无法断定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会成为未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但它生机勃勃地存在下去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中国的快速崛起,是当今世界政治的最大概念。在全球化与传统权势政治并存的国际社会结构中,什么是中国应当有的国家意识与国际意识?中国是不是应当变成和能够变成一个融入国际潮流的自由主义的国家,还是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强国,甚至一个帝国?中国现实主义代表性学者时殷弘在《中国和平崛起只是可能不是必然——从对外关系角度论中国崛起的条件》中给出的回答是:“和平崛起”是未来25年内中国的国家方向。在作者的辞典里,“和平崛起”是指:在不经国强权间的全面战争和经久冷战对抗的意义上的崛起。这要求中国务必做到两点:一是除非绝对迫不得已、决不同美国长时期对立或大规模冲突,同时争取广泛的睦邻关系;二是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的、根本的制度和价值创新。

阶级斗争学说失效了,传统国学知之不多,当今中国出现意识

形态的空白化,靠什么来凝聚中国、中华民族?除了民族主义,没有别的渠道。作为中国批判对日“新思维”的代表人物,林治波在《当代中国需要民族主义——兼论中日关系》中强调,当代中国需要一种理性的、温和的、开放的民族主义。对于近年陷于冰河状的中日政治关系,作者认为中日间的根本矛盾,就是中国崛起和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为此,中国对日的态度立场比现在硬一些更好。

近年来美日等西方大国,过分夸大中国的民族主义。其实,迄今为止,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主要特点是“防御性”,而不是“进攻性”,特别是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显示出对“进攻性”民族主义高度的警觉与防范能力。尽管如此,朱锋在《爱国:中国人的骄傲与忧思》一文中提醒:中国必须特别注意的是,一个民族的国际意识应该主导民族主义,而不是让民族主义去颠覆自己的国际意识。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最起码的国际观。

本期除特集外,长于中国政治研究的潘维在《现行中国政体面临的五大问题》中,归纳了当代中国面临的五大危机和挑战:公权力的腐化;农村社会濒临破产;大城市出现庞大贫民群体;主流社会意识缺位;外患压力日趋沉重。文章醒世:如果五大问题持续恶化,中国社会可能出现大动荡;虽然五大问题并不都是现行政体缺陷造成的,但所有解决方案都指向执政能力的改善。

目 录

特集：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与国际意识

走在当代中国主流思想界的前面——回顾与展望当代

中国民族主义 (王小东) 1

作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作者以自己的历史论作为线索，简洁而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末迄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进程，指出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长远目标就是为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奋斗，而谋划。虽然无法断定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会成为未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但它生机勃勃地存在下去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当代中国需要民族主义——兼论

中日关系 (林治波) 10

作为中国批判对日“新思维”的代表人物，作者指出：在意识形态空白化的当今中国，靠什么来凝聚？除了一种理性的、温和的、开放的民族主义，没有别的渠道。关于中日关系，作者认为：中日间的根本矛盾，就是中国崛起和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因此，中国对日本一厢情愿地求友好，一点用都没有，中国对日的态度立场比现在硬一些更有益于处理好中日关系。

融入世界的中国——一个追求国际民主、宣示中华民族

个性的过程 (张文木) 18

作者强调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但在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的语境上没有跟上这个变化。从主权、人权，到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中国

的价值观念应该从过去的阶级权的观念转向国际社会通用的法权的观念。中国要学会用西方人可以理解的法权语境来申诉和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有利于在国际间说明中国国家利益的话语体系。关于中国崛起,作者提出要有自己的哲学立场:“中国主体”,讲的是主权绝对的立场;“中国价值”,讲的是主权平等的立场。

从民族自卑到民族认同提升——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对

中国青年的影响 (房 宁)27

从80年代对西方文化的“一边倒”,对中国的基本否定性倾向,到90年代对全球化的参与和警惕并重,对中国的基本肯定性倾向,作者通过当代中国青年在接触西方文化中呈现出的大幅度意识变迁,从社会的精神层面揭示了当代中国发展、当代中国青年成长的深刻内涵。

只提爱国主义还够不够——兼论“不能盲目

抵制日货” (刘江永)40

中国在日益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大背景下,只提爱国主义还够不够?是不是应该有新的国际意识?作者认为这关系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大战略。对于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民间的对日“新思维”,对于中国一些城市的抵制日货运动,对于日本右翼的反华倾向,对于日本民族主义的走向,长于日本问题研究和安全问题研究的作者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在关键问题上要继续坚持原则,同时努力建立健康的民族主义,这是作者对中国未来与日本关系提出的建言。

爱国:中国人的骄傲与忧思 (朱 锋)50

在中国,近代以来挫折感和期盼国家强大的看法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就没有断过危机,也没有过一个统一的、完成的和坚定的理论内核。关于中国人的国际意识,作者分析说,由于始终缺乏统一的、自信的、能够对自身的发展和世界的现实建立起具有解释力和包容

力的哲学认识,必然常常随着不同的事件而上下沉浮、缺乏成熟和连续性。对此,作者强调,一个民族的国际意识应该主导民族主义,而不是让民族主义去颠覆自己的国际意识。

中国和平崛起只是可能不是必然——从对外关系

角度论中国崛起的条件 (时殷弘) 65

“和平崛起”,在作者眼里,不仅是中国的对外战略,更是未来 20—25 年内中国的国家方向。在作者的辞典里,“和平崛起”有着明确的内涵:在不经强国间的全面战争和经久冷战对抗的意义上和平崛起。作为“和平崛起”的关键,作者强调:一是中国要坚持除非绝对迫不得已、决不同美国长时期对立或大规模冲突,同时争取广泛的睦邻关系;二是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的、根本的创新。作为现实主义者,作者冷静指出:中国和平崛起只是一种或然性或可能性,而不是命定的必然。

没有解决的国家定位——影响 21 世纪中国国家定位的

五大因素 (金灿荣) 80

西方国家将当代中国看得很大很强,而中国将自己看得很弱很穷,作者认为这种落差不仅源于视角不同,更与中国的精英层对自己国家的定位还没有一个大国意识有关。作者指出,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建构阶段。其中,有五大因素影响中国在 21 世纪的世界定位:全球化、开放、现代化初步成功、台湾问题的刺激、东亚地缘政治挑战。

走出大国力量小国心态的误区——兼论中日关系的困境

与出路 (金熙德) 89

在近代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失败了。但今天,日本相对于中国有利的地位已经走到头了,其关键的背景是中国的崛起。长期研究日本外交的作者指出:今天的中国类似 80 年代初的日本,大国力

量,小国心态,这是个误区,不走出来不行,中国外交需要大国战略。关于近年来中日关系困难的根本原因,作者强调在于中日双方主流社会要走的路子正好碰撞,而共同点很少。其中,中日双方用不同的游戏规则对抗,更加扩大了分歧削弱了合作。作者提出,中国对日交流要加强细节,力避空泛。

认识当代中国的三个视角 (王逸舟)96

今日之中国,其规模之大,其问题之重,其前景之峻,需要中国的学人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从三个视角加强研究:中国的世界位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价值。低端产品庞大,高端领域虚空;参与国际组织、条约不少,主导力不足;中国古代的、西方进来的、马克思的如何融合、如何支撑中国价值?作者提出了令国人深省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世界战略——兼论“不以小泉为伙伴”

的对日外交 (日)(赵宏伟)100

久居日本、长于中国政治和国际问题研究的作者,将当代中国的世界战略解读为:扩大和深化的南北集团合作体制,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集团合作体制,并且以此形成国际关系的一极,而“和平崛起”是这一战略的关键词。在作者新颖的论述中,近年中国的对日政策被概括为:“不以小泉为伙伴”,迫使日本孤立化,引导日本放弃对美一边倒,转而“入亚”。

中国发展面临的若干问题与政策选择

现行中国政体面临的五大问题与机会 (潘 维)113

本文归纳了当代中国政权面临的五大问题:一是公权力的腐化,二是农村社会濒临破产,三是大城市出现庞大贫民群体,四是主流社会意识缺位,五是外患压力日趋沉重。长于中国政治研究的作者指出:如果五大问题持续恶化,中国社会可能出现大动荡;虽然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现行政体缺陷造成的,但所有解决方案都指向执政能力的改善。

当代中国工人的“以理维权” (于建嵘)132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大转型中,工人阶级作为整体意义的“阶级”已经失踪。其主体——产业工人的大多数已从改革前的“国家的主人”滑入到今天这个时代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作为这种转变的反应,“以理维权”的非阶级行为成了当前中国工人政治的本质性特征。

迫在眉睫的中国危机管理体制构建 (初晓波)140

作者指出,当代中国已经进入社会危机的集中期和高峰期,其背景和原因在于新旧体制并存、高速发展与全球化同步以及官民危机意识的淡漠。作者强调,危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诸问题的重中之重,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为此,传统的“被动应付”、“就事论事”式的危机管理模式,需要向危机预警、危机处理、危机弥补的综合系统性模式转换。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将对中国危机管理体制作出考验。

中国应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 (李 玲)163

中国连续高速增长20多年的“经济奇迹”,并没有带来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多数国民对医疗体制的变化感到不满。政府盲目地推卸责任,将医疗卫生推向失灵的市场,是这种错位的根源。最合适当下中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体制是什么?“政府主导型”,这是作者的答案。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杨 帆)182

作者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实质是汇率水平长期低估应该调整,而不是汇率机制的改革。作者强调重工业化时期需要大量进口资源和技术,货币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缓解通货膨胀,促进技术进步,因此不会打击出口,不会扩大贸易逆差,反而改善贸易条件,提高人民币资产价值,使得中国经济实现内外平衡发展。

严防泡沫经济的战略选择——房地产政策新思维

..... (李稻葵)189

房地产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也是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更是近年中国颇有争议的一个产业,如有无泡沫。作者从房地产业的特点、发展条件切入,运用理论、国际经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分析,指出有必要限制中国房地产业短期投资,设立短期交易税。本文采用简洁明快的课件——幻灯形式,是本刊为便于读者阅读进行的一种尝试。

一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 (Neil C. Hughes)203

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让美国人越来越担心,美国人正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指责中国。作者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大部分指责并没有什么真实价值,但是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误解却可能导向一场中美贸易大战,这对双方都将造成严重的伤害。没有争端是不可能的,但贸易战并非不可避免。作者强调,美国鹰和中国龙在解决争端时应该学会尊重差异、寻找共同点。

走在中国主流思想界的前面

——回顾与展望当代中国民族主义

王小东

摘要：作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作者以自己的历史论作为线索，简洁而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末迄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进程，指出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长远目标就是为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奋斗，而谋划。虽然无法断定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会成为未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但它生机勃勃地存在下去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几个阶段

中国民族主义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发轫，已经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人们耳熟能详的一段，不必在此重复了。在这里有必要回顾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因为它的出现，标志着自“文革”不光彩地结束之后，中国思想界一以贯之的洪流首次出现了转折，或者说是分流。这个分流一开始是非常弱小的，只有微不足道的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呐喊，但在若干年之后，终于汇成了人们不得不认真研究、对待的潮流。

一种思潮的开端，一开始似乎总是少数那么几个人，互相之间甚至都不认识，各自在那里奔走呐喊，而整个社会对他们不屑一顾，所以，其最早的发源史往往已湮不可考。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可考的较早的标志性事件，是笔者于1988年7月所写的批评当时红

极一时的电视专题系列片《河殇》的一篇短文——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激情的阴影》。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的思想水平是很低的,但它是对当时人们认为不可置疑的思想洪流的一个大胆置疑。文章一发表即引起轰动:《河殇》的作者们在包括《解放军报》在内的许多强势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围剿;同时,也获得了笔者事先根本想象不到的同情与共鸣——原来这样的思想并不是真正孤立的,只是过去没有一个媒介起联络的作用罢了。此文在国内得到几十家(准确数字无法获得)媒体的转载,并为国外多家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份标志性文献译成外文发表。这篇短文的矛头所指,就是后来笔者命名为“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潮。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之所以能有后来的影响,当然不能仅仅限于对于逆向种族主义的反思,而没有自己对于其他问题的主张。从1990到1992年,笔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经济道路的文章,其主旨即是说,从中国的国家安全需求着想,在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领域,中国仍旧有必要以国家的力量,采取超越市场划定的国际分工范围的赶超型发展战略。除此之外,因服从上述目的的需要,笔者亦批判了以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为名,造成国有、集体资产严重流失的案例。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1994至1996年,以《战略与管理》杂志为平台,以笔者和刘力群(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为一方,以林毅夫教授等为另一方,再次爆发了“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之争。在当时,这些争论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乃至社会更多的反思,直至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才有更大范围的对于当时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以及对于我们当时的经济思想的认同——虽然今天的人们很可能已经不记得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超前十多年的先见之明了。但值得强调的是,至少就笔者等人

而言,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不曾反对市场经济,都不曾赞成开历史的倒车。我们只是说,在某些有关国家安全的特殊领域,需要超越市场经济。在十多年之后,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对这些问题阐述得更准确、更细致了。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已经获得了较大势能。此后,加盟民族主义的各色人等逐渐增多。其中必须一提的是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这一分支。这一分支的代表人物前有盛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后有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其间又有盛洪等人与“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的结合。盛洪的主要观点是和平主义,认为这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本质不同之处,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就是要弘扬中国文化中的和平哲学,蒋庆则把这种观点推到了极致。他们两人合著的书《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的封面是两只绵羊。盛洪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

当我问到,“中国为了天下主义的理想,能否扩军备战”时,蒋庆先生截然地回答说“不能”。因为“善的目的不能用恶的手段来实现”。如果只能用恶的手段,那就宁肯不做。概括起来就是“以善致善”。初听到这个回答时,我大吃一惊。之所以吃惊,一是因为我自以为“刁钻”的问题被他轻易化解,一是因为这个答案我从未想过。在国际政治中,所谓“善的目的”就是永久和平,所谓“善的手段”一般是指和平手段,而“恶的手段”就是战争手段。要想“以善致善”,实际上困难重重。首先在于,如果强调尽量采取和平手段,在实际中很难对抗暴力手段。其次在于,只选择善的手段需要很强的道德自律,并忍受由此带来的当前损失,这对很多人来说难乎其难。因此另外一种选择,即“以恶致善”,就很容易被人接受,并且显得

合乎“理性”。

盛洪、蒋庆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并不为其他许多民族主义者所认同，反被斥为“阉者的梦呓”。笔者亦不能认同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故而曾发表多篇文章，从世界历史讲起，并秉承母校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的思想，提倡尚武精神。

康晓光的“文化民族主义”，着重点则在于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应走西方的民主化道路，而应回到儒家的“仁政”、“禅让”，以及社会各阶层“安分止争”上去。近几年，康晓光写了大量的文章来阐述他的观点。我们不妨称康晓光的“文化民族主义”为“新儒家文化民族主义”，这个牌号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中还是有不少认同者的，但笔者并不认同，理由将在下文中说明。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曾有一度处于相当紧张的状态。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声称：民族主义因强调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而必然反对个人的权利，由此也必然维护专制，反对民主。这种论断不符合人类历史上前现代民族主义性质的情感：如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事实；更不符合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事实上，现代民族主义者恰恰是随着现代民主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然而，当代中国的许多民族主义者不能分辨清楚这样的事实，于是形成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对立。首先，这样的错误认识对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损害。其次，这样的错误认识使得中国人，无论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根本无法认知真实的内部和外部世界：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事实上是极其民族主义的，甚至可以是军国主义的；另一方面，专制国家恰恰是民族主义弱乃至没有民族主义的可能性更大。再次，这样的错误认识使得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看不到民主化